

上篇 逻辑史的回眸与易学逻辑

第一章 近现代逻辑史的回顾^①

第一节 回眸中国近现代逻辑学的建立

一、“西学东渐”与“逻自觉”

西方称之为“逻辑”的东西，在我国是随明末的“西学东渐”才开始逐渐出现的。这是中国学者经中西比较而在文化上自觉建设的结果。但今天看来，这种自觉的建设远未进行到底。至今为止，无论是夸大中国逻辑或是贬低中国逻辑的学者大多犯了一个通病，就是以西方逻辑的标准来裁定中国逻辑，也就是在逻辑的研究上犯了比附的毛病，在对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或逻辑学的研究中太过于强调共性而忽视了个性的研究。

本文所指“中国近现代”，时间限定在 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中叶。

本节中的某些提法，受启发于汤一介先生 2002 年 10 月在南开大学的演讲。

中国古代的学术分类大致可以分为“经、史、子、集”几种。16世纪明朝末年，随基督教耶稣会的传入，西方科学文化开始在了中国的真正传播。这首先引起了中国有识之士的注意，他们站在文化自觉的立场上严肃地审视中西文化上的差异，开始注意到中西文化方法的不同。1607年，徐光启在与利玛窦合译并出版了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前六卷后，对书中所述公理方法大为赞赏，称这种方法是“不用为用，众用所基”。^①他还说道：

“下学功夫，有理有事。此书为益，能令学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兹定其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能精此书者，无一事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②

他还形象生动地说道：

“昔人云‘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吾辈言几何之学，政与此异。因反其语曰：‘金针度去从君用，未把鸳鸯绣与人’。若此书者，又非金针度与而已，直是教人开矿冶铁，抽线造针，有时教人植桑饲蚕，缫丝染缕。有能此者，其绣出鸳鸯，直是等闲细事。然则何故不与绣出鸳鸯？曰：能造金针者能绣鸳鸯，方便得鸳鸯者，谁肯造金针？又恐不肯造金针者，菟丝棘刺，聊且作鸳鸯也！其要欲使人人真能自绣鸳鸯

王重民著：《徐光启》，第5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明·徐光启著：《几何原本杂议》，《徐光启集》第7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而已。^①

1627年，李之藻和傅泛济合译完成了第一部西方逻辑学著作，这是一部由传教士带入的17世纪葡萄牙高因盘利大学耶稣会士的逻辑学讲义，主要叙述演绎逻辑，原名为《亚里士多德辩证法概论》原书共25卷，他们只译了前10卷，定名为《明理探》。但由于此书过于烦琐，影响不大。在此以后，又有几部逻辑学著作问世。19世纪末期，中国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现实痛苦，以及由此产生的“中西”、“古今”、“体用”一番争论之后，开始注意到中西的差异，不仅是枪炮轮船的差异，更为重要的是在于文化上的差异，以及产生这种差异的文化表层下面的思维方式的不同，由此逻辑学开始受到重视。1905年，严复翻译了英国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J.S. 弥尔（旧译穆勒）所著的介绍西方归纳逻辑为主的逻辑学专著，原名《逻辑体系》，译名为《穆勒名学》，并在翻译时加了很多按语，阐发他本人对西方逻辑的看法，影响很大。

西方逻辑的输入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的学者，他们抱着由比较而自觉的态度来审视这一西方传入的科学，他们怀着对民族负责任的心态，由对文化的比较，进而上升到文化建设上的自觉。他们翻遍中国古典学说，最后把目光的焦点集中在先秦的名辩学上。继西晋鲁胜之后，像章炳麟、梁启超、胡适、章士钊等一些近现代的杰出学者，重新开始对中国先秦名辩学进行整理、比较和研究，把名辩学当成是可以和西方逻辑相媲美的中国逻辑。不仅如此，为了说明文明古国在文化上所具有的先进性这一特点，他们又重新拾起了自唐代玄奘介绍到中国来的印度因明学，把因明学看成是印度逻

^① 明·徐光启著：《几何原本 杂议》，《徐光启集》第7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辑。由此，世界三大文明古国的三大逻辑传统建立起来了，也可以进行比较研究了，而且是“开创了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新篇章”。^①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专门的逻辑学著作，如章炳麟的《国故论衡·原名》、《国故论衡·明见》，梁启超在《子墨子学说》中的《墨子之论理学》，胡适的《先秦名学史》，章士钊的《逻辑指要》等等。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就是我们通过世界上三大逻辑传统的比较，找出了中国自己的逻辑学说，抬高了中国逻辑史的地位。其实这一点也是非常不简单的，因为在西方逻辑传入之前，中国的逻辑根本就没有从“经、史、子、集”的传统分类中分离出来。因此，清末民初以来的先贤们对三大逻辑传统的比较研究，毫无疑问是他们在文化建设上的自觉与努力的结果。

虽然上述先贤们的努力是非常精彩的和成果卓著的，但是这种努力只是建立“中国逻辑”的第一步，因为衡量逻辑的标准是西方的。西学输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就是为了建立与西学相匹配的学问而只是寻找中学中与西学具有共同性的东西，却丢掉了本民族具有的特殊性的东西。所以，我们说中国逻辑的研究在严复、章炳麟、梁启超、章士钊、胡适等那里只是走完了第一步。实际上，中国逻辑研究的这种态度与当时文化建设的整体情况以及与当时文人的整体心态密切相关。在总结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时，有人说道：“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基本上是由西方人发展起来的知识模式的整体引入，对于中国文化来说，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学习过程和探索过程。”^②确实，这个过程虽然在表面上看起来是做的中西文化上的比较功夫，但其实质却是中国文化“委心”于西方文化，

^① 温公颐、周云之撰：《中国逻辑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Ⅱ》，第120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

^② 陈鹏著：《“清华哲学学派”与“学”的自觉》，《哲学动态》2002年第4期。

被西方文化强行地改造了，其过程虽然痛苦，但确实是文化发展的实际过程。

二、“西化”逻辑观与“民族”逻辑观

近现代的逻辑学建设存在两种相反的观点。

一种观点是在逻辑学的研究中以西方的标准来裁定中国逻辑，这是一种“西化”的逻辑观。在对古代名学与墨家辩证的研究中就存在这样的观点，并成为风行一时的代表。

例如，把墨家辩证等同于西方逻辑。梁启超、胡适等持此说。

“西语的逻辑，墨家叫做‘辩’。（梁启超）^②

“墨子所谓辩者，即论理学也。（梁启超）

“Logic”之原语……今从东译通行语，作论理学（梁启超）^④

“这六篇《墨辩》乃是中国古代名学最重要的书。古代本没有什么‘名家’，无论那一家的哲学，都有一种为学的方法。这个方法，便是一家的‘名学’（逻辑）（胡适）

上述标题中“西化”与“民族”不同于近现代文化建设中“西化论”与“民族主义”，本文所讨论的主旨只是近现代逻辑学建设过程中的不同观点。虽然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来看，不同的逻辑观不可避免地与文化建设中的政治倾向有些关联，但又不尽相同。但是这些并非本书的中心内容。因此，所用“西化”与“民族”，只是借辞以说。

^② 梁启超：《墨子学案》，《中国逻辑史资料选·现代卷》下册，第5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梁启超：《子墨子学说》，《中国逻辑史资料选·近代卷》第304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梁启超：《附墨子之论理学》，同上书，第303页。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胡适学人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册，第130页，中华书局1991年版。

“《小取》是一篇关于逻辑的完整的论文。”（胡适）^①

这种方法是逻辑观上的“据西释中”，就是以西方逻辑为参照标准，在《墨经》中寻找与西方逻辑的对应点，也就是“比附”^②的方法。该方法在当时虽然在客观上起到宣传逻辑的作用，但是其最大弊病在于忽视了中国逻辑自身所固有的特点，其远期结果就是至今依然在学术界有一些市场的“中国古代无逻辑”的怪论。

但是，当时并非所有的学者都同意“西化”的观点。张东荪就是一例。他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逻辑，不把西方的思维模式视为人类普遍的思维模式，同样也不把西方的逻辑视为“惟一的逻辑”，相反认为既有不同的文化，就可以有不同的思维模式。他说：

“西洋哲学上的问题大半不是中国人脑中所有的问题。我因此乃觉得西方与东方在心理上，换言之，即在思想的路子上，确有不同。根据这一点，又使得我不得不承认西方人所有的知识论不能不加以修正。因为西方人的知识论是把西方人的知识即视为人类普遍的知识，而加以研究。然殊不知西方人的知识仅是人类知识中之一种而已，在此之外，尚确有其他。”^③

他还说：

“我以为不但中国人，即中国以外的其他民族，如果其文

胡适：《先秦名学史》，同上书下册，第 842 页。

梁启超在《附墨子之论理学》中曾讲道：“以欧西新理‘比附’中国旧学。”参见《中国逻辑史资料选·近代卷》第 302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转引自张汝伦著：《现代中国思想研究》，第 490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化与西方不同，自可另用一套思想程式。这种另外的一套依然不失为正确的与有效的。’^①

张汝伦认为张东荪在中西思想文化的比较上，“明确提出要比较而不要比附”。^② 比较的意义在于既比较相同，又注重不同；既关注共性，也关注个性。而在逻辑的比较研究中，关注个性尤为重要。因为只有找出个性，才能有助于中西逻辑的相互沟通、相互理解，才能促进逻辑的发展，否则只能使逻辑的研究陷于画地为牢，无助于逻辑知识增进的需要。张东荪主张“比较以见其相异更为重要”。^③ 张汝伦对其评价道：

“如果有不同的思维模式的话，那么逻辑自然也不可能是‘惟一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对墨经或名家的逻辑感到难以理解，很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思维已被起源于西方的逻辑给限定了。这里面并不存在思维的低级阶段与思维的高级阶段的差别，而是思路或思维范式的不同。相比之下，如果按照胡适的路子，用西方逻辑的观点去理解和解释墨经与名家的逻辑思想，当然可以一新耳目，但总有不少重要的、原创的东西被遮蔽或与此格格不入。”^④

张汝伦确有真知灼见。“比附”的研究方法，不仅会丧失掉中国人

转引自张汝伦著：《现代中国思想研究》，第 492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另参见张东荪：《不同的逻辑与文化并论中国理学》，《中国逻辑史资料选·现代卷》上册，第 358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② 转引自同上书。

参见张汝伦著：《现代中国思想研究》，第 493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④ 同上。

几千年以来文化传统中的那些宝贵闪光的东西，丧失掉自身固有的逻辑思想的特色，而且最终结果正好出于“比附”创造者相反的愿望，导致“中国古代无逻辑”的怪胎产生。

一个民族的传统逻辑与这个民族的传统是分不开的。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中曾经创造了丰富的人文思想，取得了辉煌的自然科学成就，这与中国古代逻辑的指导作用是分不开的。关于这点我们会在本书后边的论述中看到。当然，不能用今天西方逻辑的成就与中国古代逻辑相提并论，在逻辑观上坚持历史主义的态度是必要的。那种认为自古至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只有一种逻辑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这又使我们不得不又提及张东荪。他说：

“逻辑是由于文化的需要逼迫出来，因而不是普遍的与根本的，没有‘惟一的逻辑’而只有各种不同的逻辑。”^①

“用文化来解释逻辑，把逻辑的先在性，最高性，普遍性，必然性都取消了。”^②

张东荪的话在今天看来依然是深刻的，在那个可以说是比附“盛行”的年代，他能保持一种独立与清醒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不能不指出，虽然张东荪在逻辑研究观上坚持“民族”化的原则，但是由于他对逻辑特殊性的关注，却忽视了逻辑作为人类科学的共同性，这不能不说是他的弊病之一。

转引自张汝伦著：《现代中国思想研究》，第49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另参见张东荪：《不同的逻辑与文化并论中国理学》，《中国逻辑史资料选·现代卷》上册，第358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转引自张汝伦著：《现代中国思想研究》，第49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总的来说，这一历史时期中国逻辑学的发展印象就是，中国逻辑学的研究虽然在西方逻辑学的输入和刺激之下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仍未能十分准确和完整地把握中国自身文化传统下的逻辑学。

第二节 现当代中国逻辑研究的简单回顾^①

20世纪50年代以后，尤其是80年代以后，我国的中国逻辑史研究无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也存在不少问题。

从深度上讲，20世纪50年代以后，尤其是80年代以来的中国逻辑史研究一方面承袭了自19世纪末期以来的对中国名辩学和因明学的研究路数，另一方面又加深了这一方面的研究，出版了多卷本的《中国逻辑史研究资料选》和诸多的中国逻辑史教材、专著，以及名辩逻辑和因明逻辑的专著，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从广度上讲，拓宽了中国逻辑史研究的范围。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逻辑史研究的眼界开始扩展了。这表现在一方面我们扩展了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对象范围，诸如开始研究易学推理中的逻辑、传统数学中的逻辑以及伦理学、政治学和语言学中的逻辑等，研究的工具也不仅限于传统逻辑的方法，开始尝试运用现代逻辑尤其是数理逻辑的工具。再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中国逻辑史的逻辑研究观发生了变化。90年代中后期以后，崔清田先生接续了温公颐先生注重文化，尤其是

^① 本文所界定的“现当代中国逻辑”的时间跨度为：20世纪50年代以后至今。

语言对逻辑的影响，以及张东荪先生关注逻辑与文化相互关系的研究思路，对中国逻辑史研究方法进行了认真的反思，提出了中国逻辑史研究的三原则，即“历史的分析与文化的诠释”、“逻辑的共同性与特殊性”、“求同与求异”，这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中国逻辑史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就可以大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批判了中国古代无逻辑的怪论。1917年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英文版）是研究中国逻辑的第一部断代史专著，影响很大。但是由于胡适受到他的老师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影响，始终以西方哲学的方法来解释中国古代逻辑，“引起了多种多样对中国逻辑史所作的取消派的说法”，^② 同时也无法厘清哲学和逻辑两者的界限，“其论述反而越来越无法切中要害，偏颇与失误越来越多”。^③ 鉴于此等情况，汪奠基在1961年说道：

“所有过去这些对待中国逻辑史的虚无主义思想，正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社会形态。他们剽窃了外国哲学史的教条，来忠实地替帝国主义哲学史家伪造‘中国没有逻辑科学’的谎言。”^④

“我们重视对希腊逻辑科学的研究，但这并不等于说要以古希腊逻辑史代替我们自己民族的逻辑科学历史，或者把自己

本文所论及的是中国逻辑史的成就，主要是指那些与本书主旨相关的成就。

^② 《中国逻辑思想论文选（1949—1979）》，第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81年版。

^③ 《周文英学术著作自选集》第147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④ 《中国逻辑思想论文选（1949—1979）》，第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81年版。

民族语言表达的思想特征，勉强比附不同类型的逻辑思想学说。’^①

汪奠基还在其《关于中国逻辑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一文中对中国逻辑史研究中的两种错误观点提出了批判：指出如果在中国逻辑史的研究中丝毫不加分析地套用西方逻辑的原则，一味死板地寻找与西方逻辑同样的逻辑思维及其法则的学说，就不能保留中国逻辑学说遗产的成绩；如果盲从旧历史儒家有关对名家墨家的不实说法，也同样会“造成两千年来中国无逻辑学说的反历史的谬论”。^②

刘培育、周云之、董志铁正面指出：

“我们的祖国是个有悠久历史、有丰富文化遗产的伟大国家，我们的民族是勤劳智慧的民族。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华民族的逻辑思想就在世界上秀峰突起，大放异彩，堪同古希腊、古印度的逻辑相媲美。中华民族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逻辑遗产。”^③

上述“中国有逻辑”的观点代表了1949年以后的主流观点。中国既然自先秦以来就有逻辑，那么自然就有一个逻辑发展的历史。接下来顺理成章就是对第二个问题的研究及成就。

第二，确定了中国逻辑史的含义、对象及研究范围。关于如何认识或者说是定义中国逻辑史以及如何确定它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的

^① 汪奠基著：《中国逻辑思想史》第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中国逻辑思想论文选（1949—1979）》，第1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81年版。

^③ 同上书，第1页。

问题，汪奠基认为：

“中国逻辑史，就是研究所有留在旧中国哲学和一定的科学思想范围内的、有关形式逻辑及辩证法方面的思维形式法则及思维理论认识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包括西藏因明与自唐以后翻译的外国逻辑。”^①

“具体地分析起来，这个定义包含中国逻辑史对象和范围的三个方面：

（一）主要探索自先秦以来……所有留在旧中国哲学认识方面的有关逻辑思想法则及其理论认识的学说发生和发展的具体情况：

……

乙、中国逻辑思想表现在各科学认识中或在有关各学说中的作用、任务和发展的情况：

1. 研究中国逻辑思想与中国历代有关自然科学的思想方法，尤其是……象数演绎推论……”^②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观点是汪奠基于 1957 年提出的。其中明确地讲到要注意研究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在各有关学说、在古代自然科学思想中的作用，还特别提出了要研究“象数演绎推论”。汪奠基在其所著《中国逻辑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中还专列“汉魏天文历数与医学、农学书中的逻辑方法”一章，而且还对“宋初象数推论的演绎思想发展”作了专节的讨论。

^① 《中国逻辑思想论文选（1949—1979）》，第 9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1981 年版。

^② 同上书，第 9—10 页。

在这一问题上，李匡武认为：

“中国逻辑史应当主要指中国逻辑学说史，而不是广义的（中国）逻辑思想史，更不是狭义的（中国）逻辑思想史。”^①

刘培育认为：

“中国历史上的逻辑思想，指的是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全部逻辑思想，即各该历史时期人们关于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全部认识成果。中国逻辑思想史，则是研究中华民族各种逻辑思想发生、发展的历史。”^②

崔清田认为：

“逻辑思想属于中国逻辑史的研究范围。”^③

上述观点虽有不同，但重要的是都讨论了有关中国逻辑史的定义、研究对象和范围的问题，推动了中国逻辑研究的深入发展。

第三，探讨了研究中国逻辑史的方法。这一时期的中国逻辑史的研究，还特别注重方法的研究。汪奠基同样在 1957 年时就认为，要打破传统中国逻辑史研究囿于伦理政治的窠臼，要同自然科学的认识命题紧密结合。他说：

^① 《中国逻辑史研究》（中国逻辑史第一次学术讨论会文集）第 3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同上书，第 55 页。

^③ 同上书，第 71 页。

“必须结合中国自然科学认识的历史成果，深入研究中国逻辑思想方法的历史特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最显著的历史特点，就是因为所有逻辑论争的命题，都与当时自然科学认识的命题密切结合在一起。《庄子·天下篇》列举了惠施、公孙龙们提出的二十几个命题，其中绝大部分都属于古代数理自然科学的理论问题。”^①

“必须结合中国数学思想方法来研究中国逻辑史上所有表现演绎思想形式的历史特征。”^②

汪奠基真可谓慧眼识珠，而且极具科学的开放精神。逻辑作为方法论，不仅对先秦名墨等诸家人文思想产生影响，而且必然要与自然科学发生紧密的联系。如果只注重对古代伦理政治思想的逻辑研究，而忽略自然科学中的逻辑思想，则如车之两轮失其一，结论只能是偏颇的。

对此，汪奠基认为：

“如果只是坚持教条主义的‘名家’历史划分，那一定会取消许多逻辑科学思想的历史资料，使整个中国逻辑思想遗产，受到极大的损失。”^③

刘培育认为，中国逻辑史研究应该以实事求是为基本原则，以思想阐发与文字考辨相结合，既要用现代逻辑的工具去分析和评价逻辑

《中国逻辑思想论文选（1949—1979）》，第18—1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81年版。

② 同上书，第20页。

③ 同上书，第22页。

史上的问题，又不能单纯以现代逻辑为标准苛求古人，将古代逻辑思想现代化。^①

崔清田认为：

“（一）在中国逻辑史的研究中应坚持严格的历史性……其一……不能夸大，或缩小中国逻辑科学的历史成就……其二可以借鉴外国逻辑，但不应用某种模式塑造中国逻辑……思维的逻辑工具是和民族的语言表达密切结合的。而世界各民族的语言各有其社会历史的不同特点，因而在逻辑的组织结构上就不能完全相同。我国逻辑的名和辞，就不全等于西方逻辑体系的概念和判断……（二）应当从联系和发展中研究中国逻辑史……阐明不同时代的逻辑与该时代的政治、经济、哲学、科学等的联系，提出逻辑理论或思想得以出现或发展的根据。”^②

以上是崔清田于 1980 年 12 月在广州举行的中国逻辑史第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提出的观点，从中我们已经看出他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明确提出的“历史的分析与文化的诠释”、“逻辑的共同性与特殊性”、“求同与求异”的逻辑观的端倪。

张志建、董志铁在《试论严复对我国逻辑学研究的贡献》一文中，借对严复的评价引出他们自己对逻辑史研究方法的看法。

“严复结合西方逻辑，研究中国逻辑思想，并肯定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逻辑思想，这是正确的，也是可贵的。但他对中

参见《中国逻辑史研究》（中国逻辑史第一次学术讨论会文集），第 58—60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同上书，第 72—74 页。